

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印度尼西亚文化政策的演变(2)

代，印尼群岛地区的主导部族是爪哇族，主导文化是印度文化，以多元性而著称。据史料记载，爪哇岛的中国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能和谐相处，基本没有发生过印度教主体族群向非印度教少数民族施压的情况，体现出麻喏巴歇社会的宽容性。当伊斯兰教进入努山塔拉并成为主导文化后，族群间的彼此联系依然存在。

在荷兰殖民时期，和谐的社会多元性遭到破坏。荷兰殖民者采用“以夷制夷”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手段，实施了以社会等级制为特征的种族歧视政策。他们奉行欧洲中心主义，声称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特别是原住民文化更高级，因此，西方文化是当时的主导文化。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族群文化则被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所阻隔，形成互相隔绝的分级式多元社会。正如吉尔兹所说，这种多元社会可被划分为一个又一个的独立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与其原始纽带相联系。这种原始纽带具有先天性，包括对于家庭、亲属、种族、语言、宗教相似性的认知。他们固守各自的价值体系并时常爆发社会冲突，缺乏整



合与依存的动机。

独立运动开始后，受到民族主义激发的“本土知识分子”在意识到遭受荷兰殖民的共同命运后希望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努力使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情感转变成对国家的强烈忠诚”。1928年的《青年誓言》不再区分族群背景，而是号召组成同一个印尼国家、形成同一个印尼民族、使用同一种印尼语言，这标志着印尼民族意识的正式觉醒。在印尼社会中长期活跃着部族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文化群体，他们之间的碰撞和竞争不仅反映出这些族群的异质性，也体现出在族群动员的作用下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并以“异中求同”的精神逐渐达成

现代民族的共识。

(二) 苏加诺时期的民族主义整合

作为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延续，新生的印尼共和国面临着约1亿人口的整合任务。他们极度贫困，目不识丁，被阶层、部族、宗教、种族等族群身份所区隔，不均衡地分布在印尼群岛上。苏加诺总统发挥过人的政治天才，提出以“潘查希拉”作为建国基础，即信仰神道、公正和文明的人道、印尼的统一、协商和代表制指导下的民主以及印尼全体人民的社会公正，旨在融合社会多元性与民族共识，为印尼国家的整合提供价值基础。格尔兹指出，“潘查希拉概念是借助古典传统的比喻性延伸来构筑新的符号体系，以使用它

来赋予新生的共和政体以形式和意义的最突出努力”。潘查希拉是以根植于印尼（爪哇）文化传统的“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哲学基础”，可被视作民族整合的内容和目标，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 苏哈托时期的威权同化整合

苏哈托统治初期着重通过发展经济的方式来巩固政权，并设法遏制有关民族、宗教、政治和财富差异的煽动性言论。新秩序强调在政治上实施威权统治，在文化上实施同化政策，协同加强民族整合。中央政府往往无视地方需求，集中施政，地方政府被迫追随中央意愿，顺从执行。

总体而言，“新秩序的文化政策是建立在国家界定的规范性文化主体基础之

上的。”苏哈托通过重申潘查希拉意识形态创造一种“新”文化，即“潘查希拉领会和体验指南”

(Pedoman Penghayatan dan Pengalaman Pancasila)，简称 P4。P4条款被写入了1978年的第2号人协决定，将建国五项基础细化为36点执行方案，用以指导潘查希拉的具体实践。这种意识形态被规定为所有群众组织和社会政治力量必须遵照执行的单一基本原则，渗透到印尼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新秩序政府强调，潘查希拉能够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偏离潘查希拉就是破坏建设的努力、国家的稳定和印尼人民的特性”。苏加诺时期培育的多元性被新秩序政府视作是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威胁，从70年代开始用SARA概念取



1998年5月21日，经过多个星期的示威后，印尼总统苏哈托辞去职务，结束30多年的统治。